

收稿日期:2026-05-10

论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 及其未竟的现代性

吴云

(徐州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8)

摘要:包天笑通过“浪漫实录体”诗学艺术,系统构建了为“国”育“民”、为教践“新”、为学深广、为师尽瘁等“国民教育家精神”内涵体系,实现了对理想化教师形象的审美塑造与情感动员,为近现代“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奠定了基石。其“国民教育家精神”虽因现代历史巨变经历了被奉为经典到失语再到重启与未竟的沉浮,但却与当下的教育家精神形成了跨越时代的呼应。其创作与未竟之旅启示我们,只有把握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理想性与真实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才能真正创作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教育家精神文学经典。

关键词: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浪漫实录体;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5;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5-0098-10

作者简介:吴云(1978—),女,江苏铜山人,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5.011

作为清末民初教育文学创作的“首席”^[1],包天笑在《馨儿就学记》(1909)、《埋石弃石记》(1911)、《小学教员》(1913)、《儿童历》(1913)等教师题材作品中塑造了诸多近乎完美的教师形象,建构了具有特定内涵的“国民教育家精神”。然而这种建构在“五四”后戛然而止,抗战时期虽重启但最终未竟。当下,国家正大力倡导教育家精神,文艺界被赋予了“推出更多讴歌优秀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文艺精品”^[2]的时代使命。在此语境下,研究其“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便具有了超越文学史个案研究的价值。本研究力图揭示包天笑在“教育家精神”文学谱系中被忽视的先驱性贡献及局限,从而为当下“教育家精神”文艺创作提供历史鉴镜。

一、理想的范型:“国民教育家”及其精神内核

在《埋石弃石记》中,包天笑借师范学校校长之口赋予笔下教师崇高的精神基调:

小学教员……为吾辈后一代之国民造就此一班有益于国家之人材……盖凡国体之尊严,国家之隆运,均操诸君之掌握。窃谓教育家者,犹之建筑屋宇时埋入土中之础石,更如筑堤时投入水中之弃石也……今者觐觐诸子将役此埋石弃石之事,以博万世之叹赏,则双肩之担

荷不轻……^[3]

以“国民”和“教育家”两个核心概念为基础,包天笑将理想小学教员提升至“国民教育家”高度,在系列教师题材作品中成功对其进行现代性编码,突出了为“国”育“民”、为教践“新”、为学深广、为师尽瘁等“国民教育家精神”核心特质,为“教育家精神”书写奠定了文学基石。

(一) 为“国”育“民”

清末民初,所谓“国民教育”,是“以本国立国之宗旨,培养人民,而使之统同齐一,以为国之神元气者也”^[4],其本质是“国家中心”主义教育,核心即为“国”育“民”,这为包天笑形塑“国民教育家”提供了价值内核和根本驱动力。“国民教育家”秉承以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担荷”意识,经常讲述爱国少年、救火勇少年等故事或授予刻苦自励之贫家子弟赏牌,使学生养成热爱祖国、舍己为人、自强不息等国家所需的道德品质;引入民主、化学、物理等新知识,创办文学杂志、植物园、博览会,使学生掌握文化、农业、工业等国家所需的知识技能;开设体操、绘画、手工等课程,开展赛船、击剑、植树等活动,使学生具备强健体魄、懂美创美、热爱劳动、注重卫生等国家所需的综合素质。他们通过德、智、体、美、劳、卫教育全面培养“有益于国家之人材”。这种自觉为“国”育“民”的精神正是“国民教育家精神”中最具时代特征与社会担当的独特内涵。

(二) 为教践“新”

“我是向新道路进行的”^[5],《小学教员》中俞剑心的这句自白道出了包天笑笔下“国民教育家”群体在教育哲学与方法论上的共同特征——“新”。他们主动汲取“朗泼兰墨脱”“琅凯”“朋脱”^[5]等的现代教育理念,强调教育是爱的艺术,是校家社共育的系统工程,注重激发学生的能动性。《馨儿就学记》中何先生始终保持“慈爱可掬之笑容”^[6];《小学教员》中苟若锦用“优美高尚的歌调”教唱古诗^[5];《民国四十二年儿童日记》中孙先生带学生参观农场,使教学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7]。对这些当下仍大力提倡的“新”教法的践行使他们摆脱了死教书、教死书的旧塾师形象,转而成为理想教学环境的设计者、学生好奇心的激发者、校家社育人共同体的营造者、学生成长成才过程的守护者。为教践“新”,正是包天笑笔下“国民教育家精神”中极具前瞻性的特质,通过对这一特质的刻画,包天笑完成了对中国教师形象范式的革命性重构。

(三) 为学深广

包天笑革新了教师的教育理想、理念与方法,也重构了教师的知识结构。他笔下的“国民教育家”,虽从事基础教育,却也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儿童历》中金英明既是文学博士,又是发明“空中飞行艇”的科学家;《埋石弃石记》中沈宝铨既会吹箫,又精通古生物学和地质学;《民国四十二年儿童日记》中方先生既擅长教育管理,又是大名鼎鼎的导演。他们不仅拥有广博的学识,更将其转化为卓越的教学实践。《埋石弃石记》中沈宝铨以寥寥数语清晰阐释“木叶纹”化石的形成过程,瞬间激发了学生的科学兴趣;《小学教员》中俞剑心在体操间隙讲童话故事,在愉悦学生身心的同时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为学深广,既为“国民教育家”注入了坚实的智性基础,更回应了教育现代转型对教师学养的内在要求。兼具广博学识与卓越教学能力的“国民教育家”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学者型小学教师在文学想象中的正式诞生。

(四) 为师尽瘁

“你把儿童教育当做职业,我当他是天职”^[5],在《小学教员》中俞剑心的心中,从教不是谋生

的职业,而是事关“国体之尊严,国家之隆运”之天职。基于这种神圣化的自我期许,包天笑将“国民教育家”的敬业精神由恪尽职守的“尽责”升华为全然忘我的“尽瘁”,在文学叙事中为教师树立起崇高的奉献伦理典范。《馨儿就学记》中杨先生分文不取地为夜校上课;《埋石弃石记》中沈宝铨为抢救学生簿本与肆虐的洪水搏斗;《民国四十二年儿童日记》中孙老师业余时间带学生参观展览会。这些“国民教育家”均将个人的时间、精力、才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以具身化的实践完美诠释了“埋石弃石”的象征意义。通过趋于极致的奉献叙事,包天笑将“国民教育家”形塑为国家建设中最无私、最神圣的“灵魂工程师”,使“为师尽瘁”达到“国民教育家精神”中最具感召力与伦理高度的维度。

从“为‘国’育‘民’”的崇高使命意识,到“为教践‘新’”的现代教育理念与实践,再到“为学深广”的现代知识视野与底蕴,以及“为师尽瘁”的无私奉献精神,包天笑系统构建了既浸润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为国担当之精神,又闪烁着现代启蒙思想光辉的“国民教育家精神”核心特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清末民初,还是抗战时期,现实中小学教师收入颇低,1907年时最高月薪仅7—8元^[8],而当时《申报》普通编辑月薪是28元^{[9]316}。他们大多为谋生而从教,“按日授课若干小时,教法得当否,学生进步否,概不之问”^[10],相互之间并不和谐,小学教师常“自以为高于半日学堂教员”^[11],教法上也“于教学新法诸多未合”^[12]。因此,包天笑笔下优秀教师的典范并非如论者所言是“近代学校教师”的真实写照^[13],而是一次理想主义、乌托邦式的话语实践。

二、浪漫实录体:“国民教育家精神”的诗学塑形

为增强“国民教育家精神”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包天笑创造了“浪漫实录体”的诗学装置。“实录”表现在其作品以教学时间为序,通过对日常教育教学行为的细致描摹,营造出据“实”而“录”的真实感。“浪漫”则体现为其“实录”表象下暗藏着理想主义的潜流,以超越现实的叙事浪漫化地完成了对“国民教育家精神”的审美赋形与深情召唤。

(一) 编织真实幻象的“记”与“历”

《馨儿就学记》记录了馨儿整个学年亲历之事;《埋石弃石记》书写了沈宝铨从师范毕业到成为乡村小学校长数年间的经历;《儿童历》记叙了从年初到年底圣布衣学校的师生活动;《民国四十二年儿童日记》讲述了小学生“我”从三月到十月的所历所感。此四作标题中均含有“记”或“历”,叙事时间或以学期推进,或按月份展开,上课、游戏、考试等教学活动都被镶嵌于学制周期之中。喜剧《小学教员》标题中虽无“记”与“历”,但也以上课节次为序。这种“实录”式的叙事,模拟了线性教育过程的不可逆性,使读者边阅读边体验该过程,从而产生鲜活的真实感。在内容上,包天笑“实录”的均是教师深情讲述爱国故事、智慧处理学生矛盾、带学生参观博物馆等充分彰显“国民教育家精神”的精彩瞬间。由于被置于具体、日常的教育流程之中,这些精心筛选、富有意义的叙述便因“真实”产生了可信感,整个作品则因诸多富有意义的“实录”摆脱了庸常。因此,“记”与“历”巧妙地消弭了文学虚构与生活现实之间的界限,使包天笑笔下的“国民教育家”既“真实”完美,又堪当仿效榜样,同时也极大增强了作品的感召力。

(二) “校家社一体”的空间建构

在“记”与“历”营造的真实幻象中,包天笑构建起“校家社一体”的教育共同体,为“国民教育家精神”创造了理想化的展演空间。在此共同体中,学校不仅有教室,更有植物园、博物馆、“雨天体操场”等现代化场馆^[14]。“国民教育家”们不仅在这里传授知识,更通过“奖赏礼”“雏国会”“游艺会”等活动锻炼学生能力,使其成为有效栽培“国民”的苗圃。在教学之余,“国民教育家”

经常家访或举办“恳亲会”,将学校与家庭紧密相连。他们热心参加赈灾等社会事务,经常邀请专家、官员、名流到学校开展活动,还带学生参观农场、工厂、博览会等。通过主动联系家庭与社会,“国民教育家”成为校家社教育共同体的主导者和联结纽带。在他们精心调解下,霸凌、不公与不可调和的冲突消失,所有的问题均被成功化解。因此,“校家社一体”绝非随意安排的背景点缀,而是精心设计的空间诗学。通过构建“国民教育家”主导的高度浪漫化、理想化的空间,营造了开放、和谐、现代的教育生态,证明了“国民教育家精神”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与有效性。

(三) 作为理念载体的“讲话”叙事

《馨儿就学记》中校长在“讲话会”面向全校学生“讲话”;《埋石弃石记》中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卒業晚餐会”面向全体毕业生“讲话”;《小学教员》中视学官向“劣校长”“讲话”。在包天笑的“浪漫实录体”中,“讲话”是一种常见且重要的叙事手段。从内容来看,所“讲”之“话”,不是日常普通之话,而是国民道德、科学新知、实用技能等“国民教育”核心内容及“国民教育家精神”核心内涵。因此,“讲话”是包天笑精心设计的直接宣扬“国民教育家精神”的仪式化场景,是“国民教育家精神”最集中、最直接的艺术承载。在叙事时,包天笑通常先描绘“讲话”的场景、讲话者与听讲者的语气神态,然后完整写出“讲话”的内容,最后描写听讲者的反应以突出“讲话”的意义。多重铺垫和渲染为“讲话”营造了浓厚的现场氛围感,彰显了“讲话”的魅力,使其成为融知识、情感与审美于一体的教育微短剧,也使“国民教育家精神”得到“在场化”诗学呈现。

(四) “病贫孤死”的隐喻体系

“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15],成为道德评判的工具。在“浪漫实录体”中,“病贫孤死”被用作“国民教育家精神”的隐喻。《馨儿就学记》中罹患心痛的曾先生“未有一日之旷课”^[6],《埋石弃石记》中沈宝铨不顾被传染风险探望病入膏肓的学生家长,这些无不体现了“国民教育家”为“国”育“民”的热忱和为师尽瘁的品格,其意义均超越生理层面而成为“国民教育家”道德品格的隐喻。在包天笑笔下,杨先生一贫如洗、沈宝铨吃的是粗茶淡饭,但他们并非被动受贫而是主动安贫,物质的贫穷被转喻为“国民教育家”高尚的道德追求。包天笑还特意“为国民教育家”设计了“孤”的标签。《馨儿就学记》中的校长、蒋先生、杨先生,《小学教员》中的俞剑心、荀若锦等,均孑然一身,但家庭的缺失反而使其因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而赢得赞扬,使“孤”成为“国民教育家”“为师尽瘁”的鲜活注脚。“浪漫实录体”也常写到死。《馨儿就学记》中曾先生之死便被转喻为崇高的“殉职”,成为为师尽瘁的巅峰见证。借助对教师之死的描述,包天笑完成了对“国民教育家精神”的终极定格。通过“病贫孤死”叙事,包天笑构建了由世俗苦难到坚忍承受,再到精神升华,最后到典范教师诞生的完整隐喻转换机制。“病贫孤死”的隐喻体系使“国民教育家”形象闪耀出圣徒般的道德光芒,也是“国民教育家精神”塑形中最具伦理感召力与情感冲击力的深层诗学。

(五) “大团圆”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化

在包天笑笔下,同学之间的矛盾、教师遭遇的不公、灾难造成的苦难,最终都能得到妥善解决。通过为现实困境提供圆满解决方案,包天笑将传统的“大团圆”叙事模式改造为表现“国民教育家精神”的终极诗学。表层的圆满体现在优良的教育教学效果上。《馨儿就学记》中善妒的唐生心胸变宽;《埋石弃石记》中孤儿存武成绩优异;《儿童历》中的同学们“手工大足为全国之模范”^[14]。优良的教育教学效果直接证明了“国民教育家精神”的正确与有效,深层次的圆满体现在教育场域的公平正义上。当《小学教员》中俞剑心遭到“劣校长”打压时,“包青天”般的视学官

突然降临并开除了后者。这种“青天叙事”以理想主义方式为“国民教育家精神”的践行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公正生态。最终的圆满则指向对历史乐观主义的确认。“希望是最人性的东西”^[16],包天笑的教育题材作品总在“大团圆”带来的希望中收束,启示教师读者,付出必有回报,教育事业必将通向光明。通过对“大团圆”叙事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包天笑消解了现实生活中教师们遭遇的困境及由此产生的挫败感,将“国民教育家”的言行嵌入必然进步的宏大叙事之中,使其成为笼罩着成功光环、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的理想范型,召唤现实中的教师们仿效与实践。

从编织真实幻象的“记”与“历”到建构“校家社一体”的乌托邦教育空间,从作为理念载体的“讲话”叙事到以“病贫孤死”圣化人格的隐喻体系,再到最终实现光明圆满的“大团圆”结局,“浪漫实录体”以环环相扣的艺术手法,成功调和了“浪漫”的理想性与“实录”的真实感,使“国民教育家”既真实又令人敬仰。这种独特的叙事诗学,不仅是文学手法的集合,更是一种富有力量的情感教育与精神动员,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教育家精神”的生动烙印。

三、多源流交汇:“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的生成逻辑

特定时代的文化生产是该时代多方势力交互作用、各种条件相互耦合的结果。“国民教育家精神”内涵与“浪漫实录体”诗学艺术,均是包天笑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场域中,创造性熔铸多种思想源流、社会力量与文化诉求的产物。

(一) 救亡图强与“国家本位”教育共识的形成

由于屡遭列强欺凌,“救亡图强”便成为清末民初的时代最强音。在“近世崛起之国”中“称最”的“德与日本”受到时人称赞^[17],分别被称为“新造之雄国”与“亚洲文明之魁”^[18]。此两国的“国民教育”路径也被认定为实现“救亡图强”的捷径。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首倡“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培养“国民”^[19];梁启超随后疾呼“教育是制造国民之具”^[20];清廷、革命派与北洋军阀政府也大力倡导“国民教育”。在通过“国民教育”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点上,立场迥异的各派罕见达成了共识。包天笑笔下的“国民教育家”撷取的正是这种共识,他们抱定的是为“国”而非为君主育“民”的教育目的,教授的是各派均能接受的德智体美劳卫等内容,采用的是参与式、体验式教学方法,坚守的是为师尽瘁的教师伦理,摆脱了各党派政见之争,成为“中立”教师职业精神的典范。这一生成逻辑深刻影响了包天笑的艺术选择。为满足“国家本位”的教育诉求,包天笑大量使用“讲话”叙事,使作品带上浓厚的说教色彩,而这正是其自觉将国家意志转化为日常教育话语的必然艺术表现。

(二) “良教师”的匮乏与急切召唤

从1902年到1909年,全国“小学生数从六千多人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万人”^[21],但小学教师“能胜任”者“凤毛麟角”^[22]。这一严峻现实催生了整个社会对“良教师”的热切期盼。《教育杂志》的《教授管理》《教授资料》《教育人物》等多个栏目均围绕何谓“良教师”、如何成为“良教师”与“良教师”如何教学等展开。《直隶教育杂志》《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等刊物也发表大量相关论文。“良教师”“理想教员”“模范教员”成为当时的高频词。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书写便是这一时代命题交出的文学答卷,其多个诗学特征的生成均源自对“良教师”的询唤。第一,为了增强理想化“国民教育家”的可信度与可仿效性,包天笑以“记”“历”为名,细腻摹写教学流程与细节,创造了来自教学一线的真实感。第二,针对现实中教师缺乏主导权、教育受到多方掣肘的困境,包天笑构建了“校家社一体”的乌托邦空间,为“国民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提供了理想舞台。第三,面对教师清苦的现实处境,他构建了“病贫孤死”的圣化隐喻体系,通过赞扬“国

民教育家”对病痛的泰然、对贫穷孤独的隐忍,以及对物资匮乏的释然,委婉表达了社会对教师安于清贫的伦理期待。

(三) “儿童本位”教育思潮的译介

为广泛吸收其他国家先进经验,清末民初对教育的输入开放且多元。与德日“国家本位”思想同时涌入的还有“儿童本位”主义教育思潮,卢梭等的教育理论、蒙台梭利等的教学法被引进介绍,《爱美耳钞》(今译《爱弥儿》)等著作被翻译。该思潮强调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儿童的发展是教育的目标,主张顺应儿童天性,倡导爱与包容。“救亡图强”使“国家本位”成为清末民初教育的根本遵循,但时人又认为若儿童在关爱与主动探索中成长,便能更深刻地内化国民道德、更全面地掌握国家所需的知识与才能,因此“儿童本位”的理念与方法不仅不会削弱“国家本位”主义教育效果,反而能更有效地实现。对“为教践‘新’”的刻画便是包天笑对这一时代共识的自觉呈现。在其笔下,运动会上的竞技、植物园中的观察、儿童剧院中的演出等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取代了单调的课堂讲授,游戏、唱歌、表演等儿童喜闻乐见的活动弱化了作品的宣教倾向,缓和了单纯“国家本位”主义带来的生硬感,增添了作品的温度与美感。

(四) 破旧立新时代理想主义的盛行

随着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建立,悲观与乐观、现实与理想等充满悖论的心态在清末民初奇妙地交融,并分别催生出讽刺谴责小说与乌托邦文学。后者闪耀着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光芒,着力表达“人们力图超越现实、实现理想的愿望与期待”^[23],使中国的乌托邦形态“从‘桃花源’转向了‘新中国未来’”^[24]。该类作品中,教育被视为“万事的根本”^[25],被赋予塑造新国民、奠基新国家的神圣使命。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书写与乌托邦文学一脉相承,用理想的火光照亮教师贫穷、教育困顿的现实,将在困厄中挣扎的小学教师塑造为完美无缺的“国民教育家”典范,为教师提供了值得效仿的榜样。理想主义也促成“大团圆”叙事模式的生成。该模式虽源自传统小说,但更是包天笑对“未来必然美好”信念的文学确认。它暗示教师读者,只要秉持“国民教育家精神”,个人的努力终将因国家的进步而获得崇高的意义和价值。作品为深陷困境的教师们注入了士气,并做了精神动员。

(五) 现代中层儒师的崛起与新旧杂糅

清末民初,在上层精英大师与普通一线教师之间,以包天笑、张元济、陆费逵等为代表的现代中层儒师悄然崛起。他们均受过传统科举教育,大多做过塾师,旧学崩解后进入书局、报馆,成为手握文化资本、收入丰厚的出版人、编辑或作家,“以扶助教育为己任”^[26],受邀兼职于新式学堂,参与教科书的出版与编写。他们既服膺传统文化,又熟悉外来文化,既能与上层精英对话,亦了解一线教师真实状况,是沟通新学与旧学、上层与下层的重要纽带。作为现代中层儒师,包天笑没有梁启超等精英大师擘画教育未来的胸襟和开创性的教育思想,也没有普通一线教师源自教育困境的痛苦。这使得其笔下的“国民教育家”既不可能是《新中国未来记》中曲阜先生那样可以纵论国家教育大计的精英大师,也不会是倪焕之那样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之师,而是充满教育热情、将教育宗旨落到实处的一线教师典范。他们虽无“光怪陆离之历史”^[3],但始终立足岗位,既坚守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内核,又将其奉献对象由道统、君主置换为现代民族国家,既继承传统师道,又融入爱和宽容等现代教育伦理,是既延续儒家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又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型教师。现代中层儒师的文化身份也促成了包天笑新旧杂糅的艺术特质。一方面,他娴熟运用“记”“历”“清官”“大团圆”等传统叙事笔法;另一方面,他又细腻描绘新

式教学活动,大量嵌入承载现代教育思想的“讲话”叙事。这种融新于旧的策略,使其作品既能与精英大师的现代教育理念相呼应,又能被大量由旧式塾师转化而来的教师群体接受和模仿。

救亡图强与“国家本位”的教育共识、“良教师”的匮乏与急切召唤、“儿童本位”教育思潮的译介、理想主义心态的盛行、现代中层儒师的崛起与新旧杂糅等五大源流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国民教育家精神”从精神观念转化为审美形象的生成机制,合力谱写了中国教师题材文学早期历史上响亮而独特的“教育家精神”乐章。

四、 未竟的历程:“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的历史浮沉

在“文学四要素”中,“世界”犹如幕后导演,既潜在规定着文学书写的对象与方式,也从根本上制约着文学的接受和传播。从清末民初被奉为经典,到“五四”后“失语”,再到抗战中重启又中断,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的文学书写经历了显著的沉浮变迁,是一部关于现代中国教育思潮与文学权力交织的“未竟”史。

(一) 文化资本、一线教师与官方耦合的经典(1910年代)

在文化资本、一线教师、教育主管部门等多力耦合作用下,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确立了其在1910年代教育文学中的经典地位。

第一,文化资本有意识的策划与推介为作品经典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先是《教育杂志》专门向“北林南包”中的包天笑约稿,发现《馨儿就学记》带动该刊销量大增后,商务印书馆立即出版单行本,并将片段《扫墓》编入小学教科书,这一举动使其从一般课外读物升级为教育体系内的法定内容。随后《教育杂志》接连推出《埋石弃石记》《小学教员》,并以“凡学校诸君……以端本身作则之法”^[27]进行广告宣发,《中华教育界》也趁热刊发《儿童历》,这些使“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得以系列化呈现,形成持续传播效应。

第二,一线教师的广泛接受与再传播为经典落地提供了根本动力。对在新旧教育转型中迷茫的一线教师来说,包天笑教师题材作品对教师奉献精神的热忱礼赞、对新教育方法的生动展现、为教育难题提供的理想化解决方案,有利于增强其职业自信心和自豪感,于是将书中内容用作自我激励的范本、学习新教法的教科书、处理教育难题的必备参考,并建议“诸位少年朋友们也来试读一番”^[28],甚至“以此书为学生毕业时奖品”^{[9]385}。这种由一线教师自发形成的口碑传播使文本影响力深入了基础教育的毛细血管,最终成就了《馨儿就学记》数十万册的发行奇迹。

第三,官方的褒奖为经典最终确立注入了最具权威的符号资本。北洋政府教育部曾为《馨儿就学记》《埋石弃石记》颁发奖状^{[9]386},还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查小说报告中盛赞《埋石弃石记》是“近日小说中不可多得之作”^[29]。教育部的嘉奖与盛赞标志着包天笑所建构的“国民教育家精神”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至此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完成了经典化链条上最权威的一环。

(二) 场域转换中的范式失效与失语(1920年代-1930年代)

“五四”之后,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迅速从中心滑向边缘,并最终失语。其根源并非包天笑才思枯竭,而是历史场域的结构转换导致其创作范式与时代精神间产生了严重的断裂。

第一,教育场域发生根本逆转。一战同盟国的战败与其后国际联盟的成立使“强权即公理”的信条破产,中国知识分子欣然宣告“大战告终,武力摧折,平民主义已占胜势”^[30]。相应地,以德日为师的“国家本位”主义教育遭到批判,教育的着眼点转为“造就个人”^[31]。受苏俄革命影

响,阶级视角被引入教育,促成了“普罗教育”的兴起。在赋能“个人主义”教育和“普罗教育”面前,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书写的哲学基础已然动摇,随着《教育杂志》等刊物的革新,作品便彻底失去了发表的阵地。

第二,文学场域发生更迭。在文学场中,新文学家必须“反抗既定位置和他们的占据者”^[32],才能确立自身合法性。作为“鸳鸯蝴蝶派”盟主,包天笑是“五四”新文学家批评的标靶,其教育文学被嘲讽,“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33]。新文学家们还将“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列为“重要事件”^[34],此时,鲁迅、叶圣陶、夏丏尊等引领了教育文学方向。包天笑随之进行调整,发表了描写教师破产悲剧的《不自然的笑》,但其主动靠拢却被新文学家们斥为“冒充新式”^[35]。“鸳鸯蝴蝶派”虽坚决捍卫文学的娱乐功能,但不得不承认“不懂得什么教育”^{[9]387},其创作大多是对外国作品的改头换面,缺乏自主创新,只是“老生常谈而已”^{[9]390},于是便主动放弃了这一题材创作。

第三,社会场域弥漫幻灭心态。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长期深陷欠薪与地位低下的泥淖,悲观与幻灭之感彻底取代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理想主义激情。在此背景下,包天笑笔下完美无缺的“国民教育家”及其“浪漫”故事与教师真实境遇形成严重错位,于是被当成了不切实际的“说教”或“粉饰”。

面对教育思潮的逆转、新文学的打压和自身的不足,包天笑自觉放弃了“国民教育家精神”的文学书写。这场失语,是一种文学范式在时代场域转换后因无法适应新“艺术的法则”而必然遭遇的历史性沉寂。

(三) 战争烽火中的重启与中辍(1940年代)

1943年,包天笑在《风雨谈》创刊号开始连载《民国四十二年儿童日记》,其思想与艺术手法和早期“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一致。此创作重启源于包天笑在抗战背景下产生的双重幻觉。第一重幻觉是“国家中心”主义教育的复归。抗日战争使“救亡图强”压倒一切,包天笑误以为这与清末相似的历史语境将重新催生“国家中心”主义教育及其教育家精神。第二重幻觉是新旧文学阵营的彻底和解。1936年,包天笑与鲁迅等新文学家共同签署《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并积极投身抗战书写,被王元化赞为“正义老人”^[36],这令他产生了“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壁垒消除的错觉。但现实很快击碎了包天笑的幻觉,《民国四十二年儿童日记》连载6期便戛然而止。第一,教育场域已发生根本改变。抗日根据地正在推行“工农兵教育”,需要的是以阶级立场与群众路线为精神内核的“工农兵教育家”。而国统区教育正濒于崩溃,教师极度贫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浪漫化的“国民教育家精神”书写显得虚伪与苍白。第二,文学权力格局再次重组。新文学对通俗文学的优越感尚未消除,而更新的、大众化的人民文艺又乘势而起,沿用三十年前旧范式的《民国四十二年儿童日记》注定难以进入主流文学视野。因此,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的重启与未竟是一次由历史误认引发的错位努力,标志着诞生于清末民初的“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在完成了其短暂的历史使命后,最终被更宏大的现代性浪潮淹没和超越。

从成为经典到骤然失语再到错位重启与最终沉寂,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的命运轨迹恰如中国教育与文学现代化的动态隐喻,启示我们文学对教育理想的建构始终处于与历史动力的博弈之中,其提出的教师伦理与教育诗学问题至今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回响。

五、 余论:艺术化建构教育家楷模形象

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以“浪漫实录体”形塑了完美的“国民教育家”形象,回

应了清末民初“国家中心”主义教育思潮对“良教师”的召唤,实现了对新旧教育转型期一线教师卓有成效的精神塑造与情感动员。其着力展现的“为‘国’育‘民’”的使命意识、“为教践‘新’”的创新追求、“为学深广”的专业底蕴,以及“为师尽瘁”的奉献伦理,与当下“教育家精神”形成了跨越时代的深刻呼应,尤其是实行德智体美劳卫“六育并举”、在动手实践中培养学生科学能力、构建家校社教育共同体等新做法呈现出卓越的前瞻性,到今天依然闪烁着教育智慧。这启示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至诚报国、求是创新、勤学笃行、甘于奉献始终凝结着社会对教育者的期待。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正是这种永恒期待在清末民初的生动显影。然而,从精神内核到艺术表达,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均深嵌于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场域之中,“五四”之后,随着国际联盟成立、强权倒台,国内政治激荡、矛盾尖锐,其“国家本位”主义的教育宗旨、新旧杂糅的美学风格,以及悬置现实矛盾的“浪漫”叙事,便难以适应现实需求,最终在文学与教育双重场域转换中失语。全面抗战之后,由于教育主张与教育新思潮格格不入,理想化的“浪漫”书写与教师群体的艰难处境形成鲜明对照,“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创作虽重启但最终未竟的命运昭示了其作为特定时代教育家精神书写的历史性限度。

知往鉴今,包天笑“国民教育家精神”文学书写的未竟之旅启示当下教育家精神文艺创作需坚持三个辩证统一:一是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教育家精神文艺创作既要扎根实时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和客观矛盾,也要萃取穿越时代的精神内核,使当下的教育家精神书写成为沟通历史和未来的桥梁。二是理想性与真实性的辩证统一。教育家精神文艺创作既不能陷于日常教育教学的琐碎写实,亦不应过度理想化、浪漫化,否则,要么缺乏引领性力量,要么令读者感到虚假。创作的关键在于以坚实的教育现实与教师职业逻辑为基础进行适度的审美提炼与理想化升华,使作品兼具理想性与真实性。三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优秀作品是兼顾思想高度与艺术精度的“教育诗学”,创作时不应图解教育家精神,而要在复杂的现代性视野中深入思考教育的本质与时代的命题,并精心打磨情节、人物与语言,赋予教育家精神审美的血肉与温度。唯其如此,方能创作出直抵人心的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文学经典。

参考文献

- [1] 范烟桥. 中国小说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293.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4-08-27(1).
- [3] 天笑生. 埋石弃石记[J]. 教育杂志,1911(1):135-146.
- [4] 陆尔奎. 论普及教育宜先注重宣讲[J]. 教育杂志,1909(1):17-20.
- [5] 天笑,卓杲. 小学教员[J]. 教育杂志,1913(4):8-16.
- [6] 天笑生. 馨儿就学记[J]. 教育杂志,1909(1):75-84.
- [7] 包天笑. 民国四十二年儿童日记[J]. 风雨谈,1943(1):82-87.
- [8] 朱有瓚.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001.
- [9]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 [10] 庄俞. 教育琐谈[J]. 教育杂志,1909(1):67-71.
- [11] 敬告小学教员[J]. 敝帚千金,1905(2):18-19.
- [12] 陈恩荣. 劝各属初等小学教员教授改良书[J]. 直隶教育杂志,1907(14):9-10.
- [13] 赵娟. 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93.
- [14] 天笑生. 儿童历[J]. 中华教育界,1913(6):71-82.
- [15] 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65.
- [16] 布洛赫. 希望的原理:第1卷[M]. 梦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7.

- [17] 学部奏请宣誓教育宗旨折[M]//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217-222.
- [18] 中国之新民. 论教育当定宗旨(续第一号)[J]. 新民丛报,1902(2):30-37.
- [19] 康有为. 康有为政论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81:306.
- [20] 中国之新民. 论教育当定宗旨[J]. 新民丛报,1902(1):74-81.
- [21] 庄俞. 贺圣黼[M]//蔡元培,等.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26.
- [22] 沈颐. 普及教育议:下[J]. 教育杂志,1912(5):105-114.
- [23] 耿传明. 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J]. 中国社会科学,2008(4):176-190.
- [24] 张杨. 乌托邦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D]. 南京:南京大学,2019:87.
- [25] 悔学子. 未来教育史[J]. 绣像小说,1905(45):33-43.
- [26] 张元济. 张元济全集:第4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92.
- [27] 教育小说《埋石弃石记》[J]. 小说月报,1914(12):70.
- [28] 朱颜頔. 钝儿成功记:小说《馨儿就学记》中的一段[J]. 中华少年,1948(2):26-33.
- [29] 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查小说报告[J]. 教育公报,1916(11):14-17.
- [30] 蒋梦麟. 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J]. 教育杂志,1919(2):27-29.
- [31] 李石岑. 现代教育思潮批判[J]. 教育杂志,1922(10):1-16.
- [32] 布迪厄.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 刘晖,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93.
- [33] 周作人. 关于儿童的书[N]. 晨报副镌(文学旬刊),1923-08-17.
- [34] 圣陶. 文艺谈·七[N]. 晨报副刊,1921-03-21(7).
- [35] 西谛. 思想的反流[J]. 文学旬刊,1921(4):1.
- [36] 王元化. 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M]//王元化. 王元化集:卷一.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184.

The Literary Depictions of Bao Tianxiao's "National Educator Spirit" and Its Unfinished Modernity

WU Yun

(School of Humanities, Xu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018, China)

Abstract: By adopting the “romanticized documentary mode”, Bao Tianxiao constructs the connotation system of the “National Educator Spirit”, encompassing talent cultivati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erudite scholarship, and wholehearted dedication to education. He achieves aesthetic shaping and emotional mobilization of ideal teacher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modern literary depictions of the Educator Spirit. Despite drastic historical changes from canonical acclaim to oblivion, rediscovery and unfinished modernity, his spirit resonates with contemporary Educator Spirit. His creations and uncompleted exploration reveal that enduring literary classics on the Educator Spirit can only be produced by balancing historical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idealism and authenticity, as well as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values.

Key words: Bao Tianxiao; National Educator Spirit; romanticized documentary mode; modernity

[责任编辑:王建霞]